清末国民性批判

梁景和

This article criticizes and reveals the weak points of the national temperament at the a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lso compares Chinese temperament with temperaments of foreig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theory on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asons for national temperament.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criticism on national temperament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国民性"一词并非一个清晰和严谨的概念。在清末，叫法很多，诸如国魂、国民精神、国民品格、国民性质、国人德性、国人特点、民族性、民族魂等也都是泛指国民性而言的。国民性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但于模糊之中却有着一个大致的涵盖范围，所以可掌握其所指示的一般内容。总之，清末思想界所谓的国民性主要是指国人的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之类，有时也把风俗习惯、文明程度、知识水平纳入其中。

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先觉者便开始逐步认识中国衰败、落后及其被侵略、被欺侮的现状，从而走向救亡图存的救国之路。这是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经历一个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西艺西政的过程。然而一次次探索却一次次失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粉碎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迷梦；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政变及"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导致维新变法的失败。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并开始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从国人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今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之民，则见国势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危，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但"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者，数千年道国明民之事，其处世操术，与西人绝异故也。"①变法未竟，就在于国民性上，"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独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②中国人"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③；"中国之不变……吾民之过也"；④"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⑤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⑥可见，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需要有一个具备文明健康心态和素质的国民群体，"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肥硗燥湿寒暑，与其种族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矬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⑦基于这样的认识，引发了国人对国民性改造的思考。

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内一部分先进分子流亡到日本，后来又有大批青年学生也先后到日本留学，他们带着改造国民性的最初认识，到日本后又得到了深化。这种深化既与因异族对国人的轻侮而给国人造成的情感刺激有关，也与国外学术思想对国人的深刻影响有关，而后者则是更重要的方面。

清末，一些青年学生赴日本等地，由于其发辫和服装的奇异，常常遭到异族的侮辱和轻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巨大伤害，进而从反面激起国人改善民族体貌和形象的强烈愿望。在国外，"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号，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枪轰毙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⑧留日学生茶余饭后"在附近散步，亦往往听见妇孺

之辈‘豚尾奴，豚尾奴’的叫骂声。”[9]这些嘲弄和讥侮给国人带来的怆痛，激励国人要进行自身的改造，剪辫易服，革除陋俗。国人“各去其辫，闻者快之”，“盖数年来吾人之恶此辱国物而从而去之者，已大有日增月盛之势矣。”[10]改变“辱国物”，还只是改造国民表面的鄙俗，而改造国人心灵深层的国民性则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清末有识之士对国民性改造的执着追求，与受外国学术思想中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现世优胜民族之思想，足为吾人刺激物”，“有心人所当精心研究，撷其精华，抽其神髓，以输入传布之。”[11]当时国人在日本受的影响最为突出，他们从日本启蒙思想家的学术思想中获得启示，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及其对国民精神的倡导。日本于明治维新初期就开始对国民性进行了探索，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中村正直、森有礼等人探究了国家兴亡与国民素质之间的关系，认为国民的“德”与“智”等方面素质的提高是国家强盛与进步的条件，如福泽渝吉说：“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就是目前我国的两个要求。”[12]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国民的独立精神与文明意识，也才能抵御外侮，强国兴邦。正是由于受到日本启蒙思想的影响，国人一方面大量宣传外国人有关改造国民性的学术思想，一方面开始撰文发表自己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本世纪初，在国人创办的革命杂志上，翻译发表了有关解释西方文化成功原因的著作，包括福泽渝吉的《文明论概略》，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家永丰吉的《文明史》，福本诚的《当代欧洲》等书，为国人研究西方文化及其进行国民性研究提供了方便。与此同时，国人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杂志上，开始发表国人自己的有关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较有份量的诸多论著。受外国学术思想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严复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群之间的激烈争斗中，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提高人群的竞争能力，即提高其自身素质则是非常重要的。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细胞在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国家强弱存亡的一件大事，“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忧，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佝憨，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13]严复“三民”说的提出，实质就是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从中汲取的国民性改造的具体方案、措施与途径。梁启超也深受斯宾塞进化论影响，曾经指出：“故西儒云：国家之政事，譬之则寒暑表也；民间之风气，譬之则犹空气也，空气之烟湿冷热，而表之升降随之，丝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14]1903年梁启超在《记斯宾塞论日本宪法语》中所转述的“政治之进路，由初阶渐次以达绝顶，其进步程度，一依其国民智德力之程度以为定”一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可见斯宾塞尔的进化论学说是构成梁启超等清末有识之士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在探讨清末思想界的国民性改造思潮时，我们还要注意，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有关论述对国人提供的借鉴亦构成清末国民性改造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逐渐增多，其中包括商人、官员、传教士和学者等，由于他们在中国的长期生活，面对中国渐次衰弱的情势，开始发现中国国民性中的某些缺陷，认为中国人“好古恶新，谓政治以尧舜之时为最，外国人考察内外不同之事，惟以此件为独奇”。[15]他们还以中西民族在古今观念上的不同来解释中国贫弱的原因，指出“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敢落后，中国墨守成规而不知善变，此弱与病所由来也。”[16]美国传教士斯密斯1890年集其在华二十多年的所见所闻写成《中国人气质》一书，在上海《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

连续发表。后于1894与1896年先后在美国日本出版，书中批判了中国人麻木不仁、知足常乐、缺乏公心、保守好古等民族性格，成为国内外轰动一时的著作。1894年，林乐知还进一步研究了中西民族在主静与主动上存在着不同，认为"动静相交之际，则所干碍者大矣。"[17]显然，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和批判不能不吸引当时有识之士的关注，从中受到启示和反思是很可能的。虽然中国人对此曾表示不满，痛斥外人"讪我、诟我、病夫我，曰顽钝无耻，曰痿痹不仁，曰无教之国，何其悍然不顾平等之义至斯极也?"[18]但他们又对此引以为戒，反躬自警，从而引发了他们自己对改造国民性的探究。

二十世纪初年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出现，同时也是对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对国民性弱点认识的一个继承。十九世纪下半叶，国人中已有人开始对比中西，评判中西民族文化及民族性格的不同，并有褒西贬中的倾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钟天纬比较了中西民族的不同性格，进而提出"西人之性好动"、"华人之性好静"[19]的观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谭嗣同与严复也都有言论来揭示国民性问题。谭嗣同指出："西人以在外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内之机械制造劫运"，中国人有"固将杀尽含生之类而无不足"的好静、主俭两大致命弱点。他甚至认为中国人在体貌上亦有劫象，"拟诸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驰，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20]这些激烈言辞，旨在刺激国人，促其猛醒，从而重视体育，增强民族的体质与素质。较为全面系统深刻地比较中西民族间的不同，是维新志士严复。1895年严夏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以其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中西民族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差异作了全方位的比较，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廉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若斯之论，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21]严复虽说"未敢遽分其优绌"，但辨别优劣的倾向性则是不难领会，亦是不言而喻的。

清末思想界想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即欲从国民精神面貌的塑造及从个人道德修养上来寻求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这与传统儒家思维模式一脉相承，是传统思维惯性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心力"及道德的修练，倡导以"修身为本"，从此构筑理想的人格，《礼记·儒行篇》设计出刚毅、自立、忧思、宽裕、特立独行、尊让等一系列人格模式，用意在于整肃人心、巩固统治。清末思想家继承了这一传统思维模式，亦看重"心力"的决定作用，认为"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22]。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封建社会的整肃人心本质不同，清末进步思想家与封建儒生士大夫亦不尽相同，但用构造理想人格来改造社会的思维模式却是惊人地相似。所以梁启超称他的"新民"是直接取于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作新民"，"《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进步之原动力也。故真能得力于悔字诀者，常如以一新造之人立于世界，大学所谓日日新者耶。一人如是，则一身进步。国民如是，则一国进步"。[23]梁启超后来创办《新民丛报》，也是受《大学》的影响，"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吾民。"[24]虽然这里的"新民"与《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新民"在内容上已有了根本区别，但其思维模式却是相通的。

按着这种思维模式，清末思想界在探索国民性过程中，进行了无情的自我解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广泛地揭露，认为国人"有私家思想，无公家思想；有甘退思想，无勉进思想；有激烈思想，无温和思想；有依人思

想，无独立思想；有侥幸思想，无必成思想；有苟且思想，无着实思想；有浅近思想，无深远思想；有敷衍思想，无精毅思想；有虚假思想，无敦朴思想”[25]等就是要举。概括起来，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中国人的奴性、麻木、虚伪、自私、嫉妒、空谈、旁观、好古、保守、愚钝、无公德、无是非感、无国家思想、无独立性、无自治力、无冒险精神、无尚武精神、拖拉迟缓、不果断、不求效率等。

清末思想界这种国民性改造思潮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经常对中外国民性进行对应比较，而这种对比是以褒扬西方国民性和批判中国国民性为特征的，从而反衬出中国国民性的不足。诸如他们贬损中国人无公德，就大力称赞欧美诸国有公德，有严刑峻法；批驳中国人的奴性，就歌颂西方既不奴役别人，也不被人奴役；说到中国人的不知合群，就赞赏西方人如何“相捍相卫，如手足之于头背，如子弟之于父兄”，可谓同心同德也；谈中国人无诚意，就说欧美人言必诚，行必信；讲中国人无毅力，就说泰西诸国如何有坚忍之心，不成功不罢休；说中国人无冒险进取精神，就说西方人如何好进取，好冒险；说中国人好嫉妒，就说外国人如何好争胜；说中国人尚虚尚名尚空谈，就说外国人如何尚实尚力行；说中国人优柔寡断，就说泰西人如何当机立断等等。梁启超对中外国民性优劣不同的论述更为具体，他说：“诚以中西人之日用起居相比较，其一理一乱相去何如矣！毋曰薄物细故，夫岂知今日之泰西，其能整然秩然举立宪之美政者，皆自此来也。孟德斯鸠云：‘法律者无终食之间而可离者也。凡人类文野之别，以其有法律无法律为差，于一国亦然，于一身亦然，’今吾中国四万万人，皆无法律之人也；群四万万无法律之人而能立国，吾未之前闻。然则岂待与西人相遇于硝云弹雨之中，然后知其胜败之数也?”[26] “欧洲诸国，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鞠蹴、角牴、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之资格，昔仅一斯巴达者，今日举欧洲而为新斯巴达矣。中国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垢而驼背。”[27] “日本当四十年前美国一军舰始到，不过一测量其海岸耳，而举国无论为官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僧为俗，莫不瞋目切齿，攘臂扼腕，风起云涌，遂以奏尊攘之功，成维新之业，而我中国其时燔圆明园，定南京条约，割香港，开五口，试问：我国民之感情如何也？当八年前俄德法三国逼日本还辽、不过以其所夺人者归原主耳，而举国无论为官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僧为俗，莫不瞋目切齿，攘臂扼腕，风起云涌，汲汲焉扩张军备，卧薪尝胆，至今不忘。而我中国以其时割胶州、旅顺等六七军港，定各国势力范围，浸假而联军入京，燕蓟涂炭，试问：我国民之感情何如也?”[28] “英人恒自夸于世曰：五洲之内，无论何地，苟有一二英人之足迹，则其地即形成第二之英国。斯固非夸诞之大言也。盎格鲁撒逊人种，最富于自治之力，故其移殖他地，即布其自治之制度，而规律井然，虽寥落数人，其势已隐若敌国，是以英国殖民之地，遍于日所出入之区，中国人之出洋者亦众矣，然毫无自治之能力，漫然绝无纪律，故虽有数百万人，但供他人之牛马，备他人之奴隶。”[29]显而易见，这种对比认识大多缺乏科学的根据和严密的论证，也充斥了一些过激的言词，表现了一种情绪化的断然倾向，甚至具有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是我们一贯反对的，这种偏激的对比方法是不足取的。对于这种比较方法的直观性、伪科学性暂且在此不做过多考究。重要的是应当看到：在一个民族落后于另一个民族时，落后民族要自强和赶上先进民族，一般都要通过双方对比的模糊逻辑，来查找本民族的“弱点”和先进民族的“优点”，以此作为本民族自身进步的起点，这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符合落后民族的自身认识规律的。

清末思想界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过程中，不但着眼于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和揭露，而且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同时，还着重从理论上探究产生国人国民性格的根源是什么，反映了清末有识之士要进行国民性改造的真诚愿望。清末思想家们当时主要从政治、文化、经济的因素研讨了国民劣根性产生的历史原因。中国人“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祗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缪种流传，演成根性。”[30]

从政治上看，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封建君主为维护至高无上的君权，对官僚“牵掣之，使不得行其志，锢蔽之，使不得极其聪，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慑之”，对民众“但以压制欺吓为事，无复有诚意以相孚。”[31]在封建君主压迫下，使百姓向无权利，无自由，久而久之，便成为“放弃义务，弁髦权利，不识国家为何物，不知自治为何事”的“旁观者”[32]了。对此梁启超的分析较透彻，他说：“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施，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考得其要领之所在，尽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技术有四：曰训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33]在这种制术下，国民性格便日趋卑下，形成“拘私”、“恶直”、“崇虚”、“耽逸”[34]之品性。梁启超在分析国民性堕落的原因时还指出：“孟德斯鸠曰：‘凡专制之国，间或有贤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则甚希，试征诸历史，乃君主之国，其号称大臣近臣者，大事皆庸劣卑屈嫉妒阴险之人，此威信东西之所同也。不宁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专制之国，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若是乎专制政体之下，固无所用其德义，昭昭明甚也’。夫既竞天择之公例，惟适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澌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遗传，盘踞于社会中而为其公共性，种子相熏，日盛一日，虽有豪杰，几难自拔，盖此之由。不宁惟是，彼足踢蹐于专制之下，而全躯希宠以自满足者不必道，即有一二达识热诚之士，苟欲攘臂为生民请命，则时或不得不用诡秘之道，时或不得不为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诚也，犹可以不因此而磷缁也，然习用之，则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几何不随流而沉汩也。夫所谓达识热诚欲为生民请命者，岂非一国中不可多得之彦哉？使其在自由国，则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纯全之德性、温和之手段，以利其群者也，而今乃迫使不得不出于此途，而因是堕落者十八九焉。噫！是殆不足尽以斯人咎也。”[35]“今吾历史，一握于独夫民贼之手，设立若干种奴隶规律，划成若干套奴隶圈限，以供一己之操纵，其绝无民义可知。卢骚曰：‘契约云者，相互之词。既为奴隶，则不得论列是非，惟供人驱策而已。’是故独夫民贼，视天下人皆草芥牛马也，乃专务抹煞一切奴隶之权利，而惟以保其私产之是图，用悬一一丝不溢之奴隶格式，号召天下，入此格式者为忠为良，出此格式者为戮为辱。胎孕既久，而奴隶二字，遂制成吾国人一般之公脑，驯伏数千年来专制政体之下，相率而不敢动。”[36]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今日之中，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37]

从文化上看，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是封建纲常伦理及旧风俗、旧教育和旧学说所至。封建礼教对国民性危害极大，是封建统治者培塑中国人奴性的重要手段，“吾痛吾中国之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胥一国之人以沦陷于卑屈，而卒无一人少知其非，且自夸谓有礼之邦，真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礼者非人固有之物也，此野蛮时代圣人作之以权一时，后而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38]封建礼教，“定上下贵贱之分，言杀言等，委曲繁重，虽父子夫妇之亲，亦被其间离。”[39]“重礼则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仆仆而惟上命是听，任如何非礼，如何非法，而下不得不屈从之。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是重礼者之代表也，卑屈服从之奴性，呜呼，极矣！”[40]以儒学为核心的纲常伦理学说亦是塑造国民奴性的重要文化原因，“吾国之学说，虽有贵民轻君之大义，而数千年服儒服冠儒冠者，莫敢承用，但知元后作民父母而已，但知尊君卑臣、辨天泽高堂陛而已。”[41]“数千年来，名公臣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囿于忠孝，“为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所得

冒其名以相传习也"，这正是"中国人之所以为奴隶也。"[42]旧风俗亦影响着国民性格的健康发展，"盖为君主者，必立种种之制度，严密其仪式，以固其权力。社会之人，渐相习而重仪式，成为风尚"，"中国之风俗，一酿造奴隶之风俗也。三千年来，亦岂无一二公民之种子，间略传播，而外间万种之恶潮，随时熏染，则不啻芟夷蕴崇，绝其本性矣。""世界之所以有奴隶，不外强弱之相逼也。强者凌制弱者以为天则，弱者服从强者亦以为天则，圣经载之，儒者习之，令典行之，官场演之。衍之千百年，而强弱之真形转不见，弱者蒙强者之虎皮且可以凌制强者，强者居弱者之豕牢，亦必自甘服从弱者，颠倒迷乱，莫折其衷。而神圣不可侵犯之纲常主义，牢固益牢固，为之语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由是以君权之无限，虽日日杀人不为过；父之权固逊于君，而杀子之罪必减等。""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诺也，恳恩也，极人世可怜之状，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级社会中，居然行之大廷，视同典礼。"[43]中国社会的泥古与上行下效之风俗，亦是民智混沌、民性落后的重要原因。"凡政教之隆污，财赋之盈绌，地方之利弊，生计之厚薄，民俗之治乱，兵械之利钝，农桑之丰欠，积诸史册，郎若列眉，乃能广益，垂鉴取法，考欧西记载，绘图帖说，志之惟恐不详，言之惟恐不明，复加注释。故读一书收一书之效，阅一事增一事之识。今之寒士竭尽帛力，得廿四史一部。破其薄产，购置大书，亦云豪矣，穷昼夜钻研，只觉得帝皇国号，盛衰兴亡而已。"[44]这种重古轻今，厚古薄今之习，使民智民性迂腐闭塞。中国几千年来还有上行下效之习尚，"民情风俗皆以上威下，下应上为习惯，国民之进化与否，皆视在上者为转移"。[45]正如孔子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而中国的统治集团、官僚阶层这些所谓"上者"，却是一群糊涂愚顽奴性十足之辈，被效者如此，效仿者可知矣。中国的教育亦为奴隶之教育。中国训蒙旧法，"始入塾，先念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等书。次大学、次中庸、次论孟、次诗经、次书经、次易经、次礼记、次左传，四书五经读毕，问其如何讲解，茫然不知也。其学习诗文以求科第者，则参读左诗、律诗、试帖诗、小题文、大题文及一切精深之论文等，集诗精矣，文佳矣。问以中外之大势、家国之情形，则懵然不晓也；问以天文地理之事，亚欧非澳之名，漠然莫知所对也。如此教法又何怪民智之不开乎。"[46]民智不开自然也就无法改造自身的国民劣根性，无法造就新时代的国民性格。而且教育内容的本质大多摆脱不了奴隶教育，所谓"奴隶乎，其殆吾全国教育界精神之所注射，机体之所结集也乎。"[47]中国人注重传统学派的学说，以传统学派学说的内容为社会是非评判的价值标准，而传统学派，"无不可谓奴隶之学派也。"[48]如老子学派，讲求"静也，虚也，柔也，无为也，无动也，老派之玄妙也，即奴隶之教授法也。"[49]儒家学派为中国历朝历代所尊崇，"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之故耳。[50]

从经济上看，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是落后的封建经济，"吾中国国民固非智识之必不能开，教育之必不能立也。其可以开而终尚不可，可以立而犹若不立者何也？以生业之不坚而站足之不稳也。"[51]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无论何等人品，作为何等事业，必先预有衣食之备，使其内顾无冻馁之虞而后按步就班专心精进，可以终达目的，不至废弃于半途焉。[52]从社会经济生活考察国民性格的特征，可以把问题分析得更透彻更切实。马克思就曾以印度为例分析过东方民族的社会经济对民族性格的深刻影响，"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他们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53]这就是"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54]清末梁启超对此也有论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曰：'民无恒产，斯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呜乎，岂不然哉！……西人群学家言，谓文明人与野蛮人之

别，在公共思想之有无与未来观念之丰缺，而此两者所以差异之由，则生计之舒蹙，其尤著者也。故贪鄙之性、褊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弃之性、偷苟之性，强半皆由生计憔悴造之。生计之关系于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国民数千年来，困于徭役，困于灾疠，困于兵燹，其得安其居乐其业者，既已间代不一觏，所谓虚伪、褊狭、贪鄙、凉薄、谄阿、暴弃、偷苟之恶德，既已经数十世纪，受之于祖若宗社会之教育。降及现世，国之母财，岁不增殖，而宫廷土木之费，官吏苞苴之费，恒数倍于政府之岁入，国民富力之统计，每人平均额不过七角一分有奇，而外债所负，已将十万万两，以至有限之物力，而率变为不可复之母财，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况乎世界生计竞争之风潮席卷而来，而今乃始发轫也！国民之腐败堕落，每下愈况，呜呼，吾未知其所终极矣！”[55]

清末思想界从政治、文化、经济的角度探索了国民性格形成的原因，实际上，这为改造国民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清末批判国民性的思想家们主要是革命派和立宪派两大阵营中的骁将，由于两派政治主张不同，他们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态度往往受各自政治主张的制约，所以两派之间在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过程中，各自在前后不同时期，观念并非始终未变，两派之间在前后不同时期对这一问题既存在相同的认识，也有相互牴牾的意见，反映了清末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复杂性。在清末国民性改造过程中，两派对此有何异同，下面只作一个大致的探讨。

1905 年前，是清末国民思潮形成时期，清末思想界，探索国民思想的气氛很热烈，此时两派的观点基本相同，这些相同点主要体现于如下方面：其一，认为国民的文明进化程度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的善恶。革命派认为，“政治之善恶，常视国民进化之程度为正比例，其民为自主独立之民，其国即为自主独立之国。”[56]立宪派也提出：“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57]因而造就“民德、民智、民力”兼优的新国民是当时有识之士在舆论上积极倡导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二，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要建设新国家就要有“新民”，要培养“新民”，就要改造国民性，而要改造国民性，首先要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二十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由于在这个基本点上有一致的认识，所以都能全力投入到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斗争之中，两派刊物在宣传的力度上，在批判的视角上，在揭露国民性格的内容上，几乎都是一致的。其三，宣传国民意识与批判国民性同步进行，清末倡导的国民意识是适应新国家的新国民的新品格。批判的国民性是不适应新国家的旧国人的恶品格。两者既是一个问题，都指的是国人的品格而言，两者又是两个方面，即是完全对立的不同品格，有着善恶的区分。革命派与立宪派在宣传倡导国民意识的同时深刻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在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积极宣传和倡导国民意识，两者相辅相成，同步进行。

1905 年以后，随着两派大论战的展开，在国民性改造问题上也随之出现了各自的差异，其主要表现于：其一，是先造新国家，还是先造新国民，在两者先后关系上，两派的认识不一样。立宪派认为，民智未开，国民程度不足，无法言共和及建立新政府。只有进行国民教育，待有了新国民，才可建新制度和新政府。而革命派却强调通过政治革命建立起新国家的根本作用，认为“人心之智慧，不必恃他事开之，但恃革命之，”[58]“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有新民。”[59]其二，对国民程度的估价不同。1905 年前，两派对国民程度的估计大体相同，1905 年后认识上却发生了变化，革命派不再如以前热衷谈论国民劣根性，相反却强调国人程度并不低劣，已经具备了建立民主政体的国民品格。[60]如 1903 年陈天华还说国人“不讲公德，只图私利”，“照现在的人心风俗，恐怕是万事俱休的景况”；而时过仅仅两年，他反倒强调“吾民之聪与明，无所赋与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且当鸿昧初起、文明未开之际，吾民族已能崭然见头角。”[61]立宪派则坚持前论，认为国民程度落后低下，不适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仅适合进行开明专制。[62]其三，对塑造新国民途径的认识不同。立宪派因为视国人为“泯泯昏昏，蠢如鹿豕，知书识字者千不得一，明理达时者万不得一”的群氓，所以主张先用宣传教育的手段来提高国民的素

质，而不能急于革命，做到循序渐进，以免“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63]的恶果出现。革命派却开始主张通过政治革命，“去其沮遏”，正如章太炎所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从而迅速养成新国民。

显然，两派的观点各有其合理的一面，诸如立宪派强调通过宣传教育来提高国民程度及国民程度低下会影响新政府的建立等；革命派强调通过“阅历磨练”[64]而养成国民能力等观点，无疑都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两派的观点又都各有其偏颇之处。立宪派在是先造新国家还是先造新国民的问题上强调国民素质对国家、社会和政府的制约作用，却忽视了国民性的提高也与一个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关这一重要方面，在实践上，将会减低国民性改造的速度。而革命派由于只注重“革命明之”、“革命去之”、“革命开之”的国民性改造途径，也就疏忽了宣传教育等文化手段对国民性改造所起的巨大作用，这显然亦是明显的失误。这种失误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越发显露出来，不做具体切实艰巨的宣传教育工作，仅凭革命本身是完成不了国民性改造任务的。两派之所以在改造国民性方面出现了偏颇之处，大概又与两派的政治主张相联系，使改造国民性思想带上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立宪派强调国民素质低下，有反对革命的意味，而革命派一改前论，开始抬高国民程度，也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已“能享有完全权利”，中国已“宜改创民主政体”了。为了迎合各自的政治主张，就违反实际来对待文化问题，最终是要受到历史惩罚的，这是个历史的教训。进行国民性改造，最终是要同社会经济改造结合起来，虽然梁启超曾详细阐述过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与社会经济生活关系密切，但如何通过改造社会经济来进行国民性的改造，两派对此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到了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才有了深刻的领悟，“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65]这里可谓找到了改造国民性的基本途径。

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派与立宪派展开大论战，两派对国民性改造的认识有了分歧。由于政治的介入，两派对某些国民性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加之两派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所以1905年以后，尤其是1907年以后的国民性改造思潮与二十世纪初年相较，已显得淡化，进入了低谷。国民性改造思潮最活跃的时期是二十世纪最初几年，这几年，立宪派与革命派由于从救亡图存的视角来进行国民性探索，所以两派间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大抵相同。

清末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历史意义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首先，批判国民性是在救亡图存的动机驱使下，从国民性格的深层结构来寻求国家积弱的内在原因，这是一种积极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一个真正热爱自己国家并希望自己国家强盛的民族，在崇敬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同时，还要善于认识自己，发现其不足，并力图不断地改造她，清末思想界对国民性的批判就是出于这种深沉的爱国之心，对国民劣根性的这种批判和揭露同时也是对本民族一种鞭策和激励，它是爱国爱己的一种形式。爱国首先应当是对国家的负责。对本民族的盲目陶醉并不是真正的爱国，不过是一种变态的“爱国”罢了，这种变态的爱国被鲁迅先生称为“爱国的自大”，在“爱国的自大”驱使下，对国人不能谈不足和病状，若此就是媚外，就是不爱国。列宁曾对俄罗斯民族的奴性进行过批判，他说：“特别痛恨我们自己的奴隶式的过去……和我们自己的奴隶式的现在”，那种“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掩饰”的奴隶精神即奴性，“就是理应受到忿恨、鄙视和憎恶的东西。”[66]这种批判是真正爱国的表现。清末思想界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也是真正的爱国表现。第二，清末批判国民性思潮是追求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潮，“一代有一代之国民”，[67]每一时代的国民都有着不同的时代标准。清末改造国民性的实质是要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改造成为近代的资产阶级国民，是要以资产阶级的国民精神和国民心理取代封建时代的旧国民精神和国民的心理，这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时代使命相适应的，是时代的需要和呼唤，改造国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人的近代化的改造运动。这种人的近代化运动是整个中国近代

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弥补了仅从经济、军事、政治的落后去认识中国国情的片面，而从考察社会主体人的落后及其改造的角度去理解中国近代国情，从而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了中国落后的原因。第三，国民性批判思潮表明了中华民族是善于反躬自省的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和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使曾经处于强国地位的中国人历来深谙夷夏之辨，酣睡在天朝的“十字架”上，然而世界的西方走出中世纪后，便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跨进了资本主义新时代；生产的发展，人伦的演变，世风的进化，心灵的再生，整个文化形态按照传统与反传统的双线轨迹向前演化，最终在世界文化结构中独占鳌头，一领风骚。这一切使昔日挺立于东方的巨龙，在西方人面前败弱下来，它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使其放下了昔日老大的架子，提出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新课题。在这种鲜明的民族反思意识的驱使下，中国人开始投入到批判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这一特殊社会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中的恶劣一面，这对于在历史上一向以灿烂文明同化外来民族的古老中国来说，确乎是石破天惊、前无古人的壮举，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自我反思的民族。

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清末国民性批判思潮还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它突出体现在如下诸方面：首先，在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过程中，就揭示的具体情况而言，存在着不科学、不准确或危言耸听和言过其实的地方，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和量的定性，所以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只见中华民族满目疮痍，似乎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设想一下，若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奴性、麻木、虚伪、为我、嫉妒、空谈、无公德、无是非感、无国家思想、无自尊、无独立性、无自治力、不合群、愚昧、旁观、保守、无冒险精神，无尚武精神，迟缓、不果断、不求效率之中，这个民族还有救吗？别说长久生存，就是一天也难以维持。别说有外国列强的觊觎侵略，就是本身内耗就逃不脱亡国灭种的命运。章太炎曾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68]用这种态度对待自己，只会产主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虚无主义，其害无穷。第二，改造国民性思潮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国民性的改造与政治革命是并行不悖的，是互相促进的。然而清末思想界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却缺乏整体的设计，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色彩。立宪派在批判国民性的过程中，始终掩饰不了他们抵制革命的政治态度。由于反对革命，所以在批判国民性时，极力夸大国民程度的低下，以此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以达到抵制革命的最终目的。革命派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上，亦以能否有利于政治革命为前提。他们一方面认为，革命一起，国民性随之可得以改造，国民劣根性，便可自除；而另一方面，为了强调革命可行，革命派不顾事实，任意抬高国民程度，从而忽视了对国人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工作。“人们的觉悟是不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69]而革命派却忽视了这一点。立宪派为抵制革命而极力贬损国民性，革命派为行政治革命而任意抬高国民程度，两派在处理改造国民性与政治革命的关系上不能统筹兼顾，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第三，缺乏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综合改造意识。改造国民性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或文字上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一番急风暴雨式的口诛笔伐就能达到目的。改造国民性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文化建设，在这个建设中，应当有整体改造的意识。要通过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手段最终完成国民性的改造即完成人的近代化的历史任务。清末思想家在探索国民劣根性产生的历史原因时，比较准确地找到了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及经济生活是国民劣根性形成的重要原因，遗憾的是，清末思想家却没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综合视角，来提出一个改造国民性的可行方案，这是历史遗留的缺憾！

---

①《上今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319页。

②麦孟华：《总论·民议第一》，《时务报》第28册。

③梁启超：《新民说·第一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总务》。

④区榘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戊戌变法》第3册第155页。

⑤梁启超：《新民说·第一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

总务》。
⑥《尊新》，《唐才常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2 页。
⑦《厚强》，《严复集》第 1 册第 26 页。
⑧⑩《黄帝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下册第 745 页。
⑨实藤恵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425 页。
⑪《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 页。
⑫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1982 年中文版。
⑬严复：《原强修订稿》。
⑭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1899 年。
⑮威妥玛：《新议略论》1866 年。
⑯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1875 年。
⑰林乐知：《中美关系续论》1894 年。
⑱《论势力》，《唐才常集》，第 140 页。
⑲转自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 5 期。
⑳㉒《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56 页，第 460 页。
㉑严复：《论事变之亟》。
㉓梁启超：《自由书·说悔》。
㉔《新民丛报》创刊号《本报告白》。
㉕《大公报》第 4 册第 57 页。
㉖梁启超：《新民说·第十节·论自治》。
㉗梁启超：《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
㉘梁启超：《新民说·第八节·论权利思想》。
㉙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㉚㊱㊸㊼㊽㊾《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 1 集。
㉛㉞汪康年：《中国自强策》，《时务报》第 4 册。
㉜觉民《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12 期。
㉝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
㉟(55)梁启超：《新民说·第十八节·论私德》。
㊲《说国民》，《国民报》第 2 期。
㊳㊴㊵《权利篇》，《直说》第 2 期。
㊶杨笃生：《新湖南·第四篇》。
㊷邹容：《革命军·第五章》。
㊹《开民智法》，《大公报》1907 年 8 月 3 日。
㊺《论中国民智闭塞之原因》，《大公报》1902 年 9 月 14 日。
㊻《开民智法》，《大公报》1907 年 7 月 21 日。
㊿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 31 期。
(51)(52)《兴教育以养民为基说》，《大公报》1904 年 4 月 19 日。
(53)(5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波斯和中国》。
(56)《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 3 期。
(57)梁启超：《新民说》。
(58)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59)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第 8、9 期。
(60)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汪兆铭：《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议》。
(61)《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8 页、第 206－208 页。
(62)梁启超：《开明专制论》。
(63)《康有为政论选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上册第 475 页。
(64)白话道人：《国民意见书·说种界》。
(65)《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94 页。
(66)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列宁论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部 1955 年版，第 242－243 页。
(67)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 4 期。
(68)《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 1977 年版，上册第 276 页。
(69)《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077 页。

（作者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 100089）